

#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居住空间分异与失地农民 社会融合的作用机制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张海娜<sup>1,2</sup>, 朱贻文<sup>1,2\*</sup>, 邓晓翔<sup>3</sup>

(1.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上海 200062; 2.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 上海 200062;  
3.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 上海 200062)

**摘要:**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国城镇化已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城镇化,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失地农民的居住形态由原来的宅基地建房为主转变成征地补偿房、租房和自购商品房等多种形式并存,即出现了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居住空间分异对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会产生重要影响,但其作用机制的有关研究尚少。论文基于长三角地区的调研数据,以“社会—空间”为主要视角,从住房类型(含区位)和住房人均面积2个维度衡量居住空间,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居住空间对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作用机制为:一是不同居住空间的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程度有显著差别;二是住房类型对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影响最大,住房面积则影响不大;三是性别、年龄、职业、收入、获得非农户口的时间等因素也与住房类型共同产生作用。为推动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提升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可采取的措施有推行混合居住模式、增强就业能力以及政府增加投入提升城郊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等。

**关键词:**居住空间;社会—空间;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长三角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演进,中国城镇化率持续上升。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再次强调,要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到2011年首次突破50%再到2019年达到60.6%,城镇常住人口达到8.48亿。中国城镇化率连续多年保持每年超过1个百分点的增

速,这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标志性的节点,表明中国城镇化的程度、深度和广度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也要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要以提升质量为核心,这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和“新”的时代内涵。快速城镇化的背后是城市空间的剧烈变化以及相应的社会变迁<sup>[1]</sup>,其中,城市郊区的大量土地被征用,城郊失地农民的规模不断扩大。该群体和进城农民工、居村农民共同构成了农业转移人口的3种类型<sup>[2]</sup>。因此,在乡村振

收稿日期:2020-06-01;修订日期:2020-1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043);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9JJD840001);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计划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201701070005E00041)。[**Foundation:**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13&ZD043; Major Program of Ke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Base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No. 19JJD840001; Major Projec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rogram of Shanghai Education Commission, No. 201701070005E00041.]

**第一作者简介:**张海娜(1980—),女,浙江省绍兴市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

E-mail: hnzhang@admin.ecnu.edu.cn

**\*通信作者简介:**朱贻文(1988—),男,上海市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产业集群。E-mail: ywzhu@geo.ecnu.edu.cn

**引用格式:**张海娜,朱贻文,邓晓翔.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居住空间分异与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作用机制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21,40(1):135-146.[Zhang Haina, Zhu Yiwen, Deng Xiaoxiang. Mechanism of residenti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ffect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landless farmers in suburb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1): 135-146.] DOI: 10.18306/dlkxjz.2021.01.013

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充分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是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关键所在。

“失地农民”一般是指其所有土地被征用、或部分土地被征尚余少量土地(家庭人均耕种面积少于0.3亩,即0.02 hm<sup>2</sup>)但难以土地为生的农民。鉴于农民土地征用后其户籍未能转变为非农户籍<sup>①</sup>的原因极其复杂,故本文不将该群体列入研究范围之内,即主要聚焦于获得城镇户口的城郊失地农民的讨论。“作为国家层面的政府通过政策的制定和改变促使农民在户籍意义上完成向非农身份的转变的同时,职业身份也由原来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转变为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sup>[3]</sup>。与此同时,该群体在居住形态上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大部分从原来相对分散的宅基地建房,搬进了集中居住的安置小区,也有一部分购买商品房或者租房等,即使仍然居住在原来宅基地建房的,周边环境也与征地之前有所不同。总之,无论哪一种形式的居住形态,其居住和生活空间都发生了一定变化,即出现了居住空间分异现象。

社会空间分异是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地理学的经典研究议题<sup>[4]</sup>。“居住空间”不仅是物质的空间,也是一种社会空间。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最早提出空间生产理论,他明确指出“空间”不仅仅是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感知空间的三元融合,更是社会与空间的辩证统一<sup>[5]</sup>。研究中国失地农民的居住空间问题,不仅是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体现,也契合了关注本土化和地方性的现代人文地理学思潮<sup>[6-7]</sup>。因此,居住在不同类型的空间里的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状况是否存在区别,居住空间对社会融合影响是否显著,其影响是直接的、还是由于其他因素的影响所致?这些都是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需要关注的问题。本文基于对长三角地区的调研数据,试图回答以上问题,并对如何推进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提出建议。

## 1 居住空间分异与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研究进展

### 1.1 “空间—社会”视角下的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和社会分层的国外研究

西方很多学者早在20世纪初就关注到城市空

间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群体意识的形成和社区文化的建构,二是资源分配的影响和支配权力结构的塑造,三是不同阶层间交流的阻断和隔离。其中,有较大影响的代表人物和观点为:(1) 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家提出的同心圆学说、扇形学说和多核心学说等,学者们借助构建空间模型对城市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制度与制度之间以及群体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结构进行探讨和分析。(2) 哈维(David Harvey)<sup>[8]</sup>、苏贾(Edward Soja)<sup>[9]</sup>提出的社会空间辩证法理论跳出了空间单纯作为物质载体的范畴,反映到城市居住空间层面,其主要视角为:一方面,生活工作的空间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邻里、社区可以塑造、改变和保持该空间的定居者、生活者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另一方面,生活在其中的人也不是被动的,而是在不断创造、调整着居住空间,其价值观、思想行为也不断地影响着邻里和社区<sup>[10]</sup>,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和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持续的。(3)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sup>[11]</sup>则提出“空间是社会的表现”这一观点,更加关注对空间形成背后的社会结构、体制、权力等的剖析。至此,“空间—社会”逐渐成为一种研究范式。

居住空间分异和社会分层、社会融合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空间—社会”研究范式的应用。从理想状态而言,在一个较大的区域里,如果每个群体中的个体匀质地分布在该区域的整个人口中,那么,可以认为群体分布在空间上是完全混合的,该区域的社会空间是匀质的;反之,如果与匀质理想状态的偏离程度越高,就可以认为该区域的空间分异程度也越高。居住空间分异(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是指具有特定特征和文化的人群在城市中居住在一起从而形成特色邻里的倾向<sup>[12]</sup>,即城市中同一阶层的人在居住和活动空间上日益体现出同质性,从而形成城市空间的区位化分布。1967年,雷克斯和摩尔基于英国伯明翰市住宅资源的调查,在《种族、社区和冲突》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住房阶级”这一概念,此后,住房被视为不同社会阶层的重要表征和物质符号,日益成为众多学科分析和解读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维度<sup>[13]</sup>。近年来,沙森(Saskia Sassen)<sup>[14]</sup>在研究了“全球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后,提出了作为社会极化(social polarization)的空间

① 土地被征用并不意味着户籍自动转为非农户籍,一般根据土地被征用的比例和家庭人均耕种面积是否少于0.3亩作为标准来确定是否“农转非”,有的地方还实行申请制度。

后果,“分裂的城市(divided cities)”和“二元城市(dual cities)”开始出现,一极是城市精英阶层的防卫型社区,另一极是弱势群体、贫困人口高密度聚居的城市中心地带,由此形成了穷人与富人居住区的空间隔离。由于社会极化、居住隔离等现象的进一步演化和发展,在西方社会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系列社会后果和社会问题,这也客观上成为了居住空间分异研究不断演进和深入的动力。

### 1.2 国内学者关于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

社会空间、居住空间分异作为西方学者研究的重要研究视角,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国内对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社会阶层分化是研究中国城市居住空间结构与分异的重点之一。吴启焰等<sup>[15]</sup>认为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是社会阶层分化通过市场宏观控制、个体择居行为心理的局部调整而实现的空间化过程。边燕杰等<sup>[16]</sup>、李强等<sup>[17]</sup>、刘精明等<sup>[18]</sup>认为居住空间分异现象的实质就是居住在不同空间里的社会群体对城市空间资源的占有状况,住房产权、面积大小和居住质量受到个人和家庭的收入、职业和其他很多因素的影响,与该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无疑是密切相关的,是社会分层的表现。

居住空间分异程度的量化研究则主要是基于经济社会人口统计数据、住宅价格和社区内居民的经济收入等数据来计算居住空间分异指数或隔离指数。但目前隔离指数的计算仅能反映同质人群居住物质空间的聚集程度,而很难真正意义上测算出社会阶层之间交往的隔离,因为在计算过程中往往无法将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交往与融合程度这一最难量化但最重要的指标进行精确的测量<sup>[19]</sup>。

### 1.3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和中国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研究

居住空间分异是与城市发展相伴生的一种常态,本身并不是问题,但是居住空间分异程度严重会导致社会隔离和社会排斥,就会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目前,中国学者在城市居住空间分异领域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外来人口群体<sup>[20-22]</sup>,而对于城郊失地农民的相关研究则较少。相关的研究也主要探讨失地农民集中安置住房这一方式引发的居住空间分异及其对社会网络拓展、社会融合的不利影响。

罗震宇等<sup>[23]</sup>、潘泽泉等<sup>[24]</sup>认为,政府对失地农民进行安置时,往往采用集中安置方式,其集中居住

区域与市民住宅区在地理空间上存在一定的区隔,这引发了新一轮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影响有效的群际交往和互动,造成城市居民与失地农民之间新的隔阂,进而影响该群体融入城市生活。赵琴<sup>[25]</sup>将失地农民的集中安置方式分成集中居住和混合居住2种,认为失地农民的总体城市融入水平偏低,居住空间分异对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影响显著且为负,这不利于失地农民融入新的城市生活。一方面,农民在失地进入城市后,往往社会交往意愿不强,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纳入同基本属于同一阶层的群体的社会网络中<sup>[26]</sup>,故其社会网络依旧呈现出规模小、密度高、同质性强、异质性弱的特征<sup>[27]</sup>,交往具有内倾性、内卷化、边缘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地理位置上看,新形成的失地农民集中居住的地域性社区虽属于城市,但居住群体的特点和社区管理方式也大多沿用农村的旧模式,故其实质仍是农村社区<sup>[28]</sup>。因此,受居住空间分异的强烈影响,失地农民进城之后仍未突破血缘和地缘为主要特征的乡村社交网络,在农村传统社会网络资本向城市现代社会资本转变的夹缝中生活<sup>[29]</sup>。

总之,目前关于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对失地农民影响的研究较少,现有的少量研究也主要关注集中安置小区这一类型居住模式,相关研究存在以下4方面的不足:第一,政府集中安置失地农民居住固然是城郊失地农民主要的居住模式,但有必要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市场机制角度将居住类型进行细分,把集中安置小区这一模式和其他住房类型(“宅基地建房”“单位(学校)的宿舍或公寓”“征地补偿房”“租房”“自购商品房”)进行对比,这样的分析更为全面;第二,住房类型涵盖了区位这一重要因素,一般来说,“自购商品房”在区位、品质上更有优势,个体或家庭的经济承担能力也更强、主动融入城市的意识可能也更强,因此,通过不同居住模式的比较能挖掘出影响社会融合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第三,居住空间除了居住类型和区位外,人均住房面积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在以往研究中该维度涉及较少;第四,大部分研究是基于对城市一个社区或几个社区的调研而展开的,而对于城市间的比较、区域的研究很少。因此,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的调研情况,将城郊失地农民的居住空间分为住房类型和人均住房面积2个维度分别讨论,考察这2个因素对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影响是否显著,在此基础上加入性别、年龄、职业、收入、获得非农



户口的时间、区域等控制变量后的变化情况进行检测,以期对不同区域、不同特征群体之间进行比较和全面考察。

## 2 数据与方法

### 2.1 案例选取与数据来源

#### 2.1.1 研究区域选择

本文选取长三角地区为调查区域,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首先,长三角城市群是全球公认的6大城市群之一,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之一,也是最具有经济活力、改革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二,长三角地区的常住人口2.2亿,约为全国的1/6,是全国人口流入最多的区域之一,其城镇化水平也处于全国前列,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第三,长三角区域具有在高起点上实现高质量一体化的基础、优势与条件,地区间的交流合作已经开展了数十年,许多关键领域已实现对接融合,城市群管理协调模式得到了广泛认可,尤其在产业体系构造和产业链上下游合作、破除行政壁垒和垄断、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一体化配置、环境保护等领域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对全国也具有推广性和示范意义。因此,在当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之下,长三角地区的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sup>[30-31]</sup>,本文的结论和经验可以为各地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所借鉴,而对于一体化程度和城镇化程度相似的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借鉴价值则更大。

需要说明的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中的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3省1市,但由于安徽省为人口流出大省,其城市郊区与其他省市差别明显。因此,本文中的长三角地区仍为两省一市,即江苏省、浙江省以及上海市(图1)。

#### 2.1.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于2014年6—11月期间在长三角区域的入户调研和2018年7—9月的跟踪补充调研,具体地点为上海市、江苏省苏州市和无锡市以及浙江省湖州市。调研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遵循“样本城市→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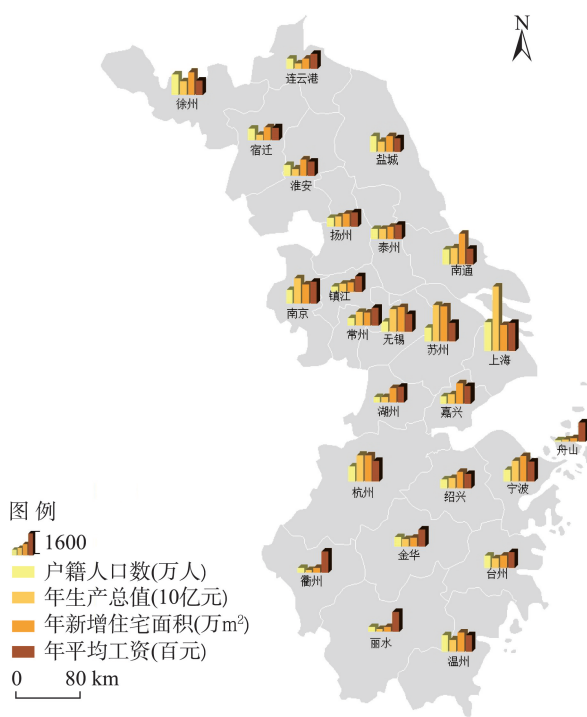


图1 长三角部分地区主要社会指标(2019年)

Fig.1 Main social indicators of par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2019

本行政区→样本街道→样本居委会/村委会→样本户→个人”的程序,共获得10个社区的城郊失地农民有效问卷720份。

#### 2.1.3 样本分布

在调研的抽样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样本在性别、年龄、职业和收入等方面的特征和分布。本文所调研样本分布如下:(1)性别方面,男女比例为48.5:51.5,性别比相当;(2)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初中”分别占28.7%和35.1%，“高中”占12.9%、“大专”及“大学本科及以上”分别占11.8%和11.4%,与当年全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大致相当<sup>②</sup>;(3)年龄方面,56岁以上的占比为50.1%,呈现老龄化明显这一特征,但与城郊失地农民的实际情况相符;(4)职业和收入方面,从所从事的职业来看,以企业职工(17.6%)和自雇佣(13.8%)为主,“离退休”占27.8%,与年龄分布吻合;(5)收入方面,“平均工资及以上”的占39.3%，“无业或待业”占20.7%，“无收入”有29.3%,与实际情况吻合。总之,从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职业和收入的分布特征

② 2014年全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05 a,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36%,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16%<sup>[32]</sup>。

来看,该调研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2.2 变量设定

2.2.1 因变量

社会融合这一概念有着多重内涵,国内学者目前主要有2种理解。一种是把“社会融合”与“市民化”基本等同,另一种是认为社会融合是不同个体、群体或文化间的相互配合、适应的过程。例如,任远等<sup>[33]</sup>从自我身份的认同、对城市的态度、与本地人的互动、感知的社会态度这4个方面进行测量。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融合是市民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指的是城市社会中各群体之间的融合程度,强调个体、群体之间的互动;社会融合是与经济融入、市民权的获得和身份认同相并列的,共同构成了市民化的4个维度。由于对社会融合的理解不同,因此对其测量方法也大相径庭,大部分研究采用的是单一的综合变量或者代理性的变量来考察,如个人的身份认同、城市生活满意度,或者继续居住城市的预期等,这样的操作相对容易,但是不可避免的是,许多对社会融合过程有着重要影响的信息被忽略了,这会影响进一步深入和细致的分析。

社会融合在表现形式上可分为情感融合和行为融合。从过程来看,又是以社会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主要以规模和结构作为观察点,其实质性意义主要在于为该网络中的成员提供社会支持。根据 Van der Poel<sup>[34]</sup>的研究,将社会支持分为3大类型:实际支持、交往支持和情感支持。事实上,在实

践过程中,这3种类型的支持往往交织在一起,即个体向社会网络成员寻求支持和帮助,得到了成员的及时响应、有力支持和有效帮助,在该过程中也促进和加深了成员间的相互了解,有助于拓展社会网络的广度和深度、增加社会信任;纵观整个过程,既包含了情感层面,也包含了行为层面。为此,对于社会融合的测量就转化为社会交往、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这3个一级指标。

基于城郊失地农民的特点,本文主要通过和城市居民的交往频率等6个问题作为具体的指标来测量,这些指标都是通过对其按1~5进行赋值(表1)。通过赋值,可以对受访样本个体和群体在每个指标上的得分进行计算和比较。

2.2.2 自变量

在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空间分布相关研究中<sup>[35-36]</sup>,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反映的是不同社会群体对城市空间资源的占有状况,居住条件改善程度和不同区域的住房类型往往作为阶层划分的依据,因此,对于居住空间通过住房类型、住房区位和人均住房面积这3个指标来衡量。

(1) 住房类型和住房区位。在住房研究和阶层研究中,区位显然是居住空间分异分析和研究不可忽视的、甚至最为重要的要素,但是,对于城郊失地农民而言,原来绝大部分住在宅基地建房,土地被征用之后,征地补偿房往往也是原地安置或者就近安置,区位类似;而自购商品房则往往也是其经济实力的表征,一般而言,自购商品房在区位上也是

表1 社会融合的衡量指标体系及赋值  
Tab.1 Index system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indicator value assignment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赋值(1~5)
社会交往	人际交往范围	“非常广泛”=5,“比较广泛”=4,“一般”=3,“不广泛”=2,“很不广泛”=1
	与其他城市居民的交往频率	“交往很多”=5,“交往较多”=4,“交往较少”=3,“交往很少”=2,“从不交往”=1
社会信任	城市居民的友好程度	“很友好”=5,“比较友好”=4,“一般”=3,“不太友好”=2,“很不友好”=1,而对于选择“没有接触过”的虽然很少,但是由于没有接触很难判别友好程度如何,故取中间值3
	求职途径	“通过城里的亲友找到的”=5,“通过老家的亲朋好友介绍找到”=4,“自谋职业”=3,“职业中介机构介绍”=3,“政府安置”=2,“其他途径获得工作”=2,“没有工作”=1
	受到不公平待遇将采取的行动	“找法院”“找政府部门”“诉诸媒体”=5,“找村(居委会)干部”“找单位领导”=4,“找熟人”=2,“沉默”=1,“没有遇到不公平”和“其他”取中间值3
社会参与	参加居委会(村委会)的选举	“这是我的权利,当然会考虑参加”=5,“有点犹豫,看情况再说”=3,“与我无关,不参加”=1,“其他”取中间值3

最好的。也就是说,住房类型对于城郊失地农民来说不仅仅包含了类型本身,也包括了区位。因此,对该自变量赋值时借鉴王桂新等<sup>[37]</sup>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研究和程名望等<sup>[38]</sup>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测度中的赋值方法,“自购商品房”为5分,然后依次是“租房”“征地补偿房”“单位(学校)的宿舍或公寓”“宅基地建房”和“其他”。

(2) 人均居住面积。问卷调查采用的是直接填写面积,故对该变量进行赋值时,将其在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住房总面积和常住人口相除)和2014年当地城市人均住房面积<sup>③</sup>相比,“大于等于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的为1分,“小于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的为0分。

2.2.3 控制变量

为了使模型的解释更加科学、精确,还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获得非农业户口的时间、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主要职业身份、个人月收入、享有的社会保障以及所属地区等10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表2)。

对问卷的因变量在统计软件 SPSS 22.0 中进行检验,克朗巴哈(Cronbach)系数为 0.762,巴特莱(Bartlett)球形检验的 KMO 值为 0.804,表明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良好。

3 居住空间分异对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影响

3.1 城郊失地农民居住空间和社会融合的基本特征

首先,就居住空间而言,城郊失地农民的住房类型以“征地补偿房”为主,人均居住面积绝大部分达到该城市人均面积。具体为:(1) 对于住房类型,城郊失地农民的住房以“征地补偿房”为主,占 66.0%，“宅基地建房”和“自购商品房”次之,分别为 14.0%和 13.1%，“租房”为 5.0%,其主要原因为土地征用后补偿房尚未到位的过渡期或者在离家较远的区域工作,“单位宿舍或公寓”和“其他”则很少,仅为 0.4%和 1.3%。(2) 对于人均居住面积,“达到该城市人均面积”的比例为 85.6%,而未达到的仅占 14.4%,因为无论是“征地补偿房”和“宅基地建房”,面积一般都比较大(表3)。

根据均值统计结果,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程度为 3.20(表 4),介于“一般”和“比较好”之间,其主要特征为:第一,社会网络的规模扩大和异质性增强,但社会交往仍然有“内卷化”倾向;第二,与城市居民互动仍然不足,但认为城市居民较为友好;第三,社会信任的强关系和多元化并存,但对普遍信任(无特殊指向的,是对社会、体制以及陌生人的信

表2 控制变量的定义及赋值  
Tab.2 Definition and value assignment of control variables

变量名称	变量类别和赋值
性别	二元变量:男性=1,女性=0
年龄组	连续变量:“18岁以下”=1,“18~30岁”=2,“31~40岁”=3,“41~55岁”=4,“56~60岁”=5,“61岁及以上”=6
获得非农业户口的时间	连续变量:“不足1年”=1,“1~3年”=2,“4~6年”=3,“7~10年”=4,“10年以上”=5
政治面貌	类别变量:“群众”=1,“共青团员”=2,“民主党派”=3,“中共党员”=4
婚姻状况	类别变量:“已婚”=1,其余选项=0
教育程度	连续变量:“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或技校)”=3,“大专”=4,“大学本科及以上”=5
主要职业身份	类别变量:“无业或待业”=1,“传统农牧渔业和其他零星打工”=2,“个体或私营企业,现代种植/养殖业”=3,“企业正式职工,居委会或村委会干部”=4,“专业技术人员、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5分
个人月收入	连续变量:“无收入”=1,“高于1元、少于最低生活保障”=2,“大于等于生活保障、少于最低工资”=3,“大于等于最低工资、少于平均工资”=4,“大于等于平均工资”=5
社会保障	类别变量:“无任何保障”=1,“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1.5,“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1.5,“商业保险”=1.5,“城镇职工保障”=5,“城镇居民保障”=5
所属地区	类别变量:“上海”=1,“苏州”=2,“无锡”=3,“湖州”=4

③ 2014年所调研的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如下:上海市35.1 m<sup>2</sup>,江苏省无锡市37.9 m<sup>2</sup>,江苏省苏州市43.8 m<sup>2</sup>,浙江省湖州市38.2 m<sup>2</sup>(根据上海市、无锡市、苏州市和湖州市政府发布的统计年报、统计年鉴等材料整理)。

表3 城郊失地农民住房类型和面积的基本情况  
Tab.3 Housing type and area of landless farmers in suburbs

项目	频数	百分比/%	项目	频数	百分比/%
住房类型(含区位)			人均居住面积		
数据缺失	2	0.3	未达到该城市人均面积	104	14.4
宅基地建房	101	14	达到该城市人均面积	616	85.6
自购商品房	94	13.1			
征地补偿房	475	66.0			
租房	36	5.0			
单位宿舍或公寓	3	0.4			
其他	9	1.3			

任<sup>[39]</sup>)不高;第四,对公共事务较为关注,社区参与度高。

3.2 居住空间分异对社会融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要全面深入考察居住空间分异对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将人际交往范围等6个指标组成的社会融合作为因变量,以住房类型和人均住房面积作为自变量,以性别、年龄等客观指标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结果见表5。其中,在模型2中,原有控制变量为10个,经过共线性诊断,发现存在明显多种共线性现象,“受教育程度”和“所属地区”排除后,各个控制变量的VIF均在2.0以下,可认为基本消除共线性。

表4 社会融合各指标的均值统计  
Tab.4 Mean values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dicator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均值
社会交往	人际交往范围	3.03
	与其他城市居民的交往频率	2.85
社会信任	城市居民的友好程度	3.69
	求职途径	3.65
	受到不公平待遇将采取的行动	2.30
社会参与	参加居委会(村委会)的选举	3.82
社会融合	—	3.20

3.2.1 居住空间分异对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影响

模型1表明,住房类型(含区位)对于城郊失地

表5 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回归分析结果  
Tab.5 Regression results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landless farmers in suburbs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2共线性统计量	
	系数	t	Sig.	系数	t	Sig.	容差	VIF
常量		23.264	<0.001		24.184	<0.001***		
住房类型(含区位)	0.090	2.412	0.016	0.095	2.962	0.003***	0.979	1.022
人均居住面积	0.059	1.686	0.103	-0.027	-0.760	0.448	0.806	1.241
性别				-0.119	-3.588	<0.001***	0.902	1.109
年龄				-0.358	-10.471	<0.001***	0.856	1.168
获得非农业户口的时间				0.058	1.770	0.077*	0.927	1.078
政治面貌				0.068	2.043	0.041**	0.908	1.102
婚姻状况				-0.049	-1.518	0.129	0.951	1.051
主要职业身份				0.238	6.992	<0.001***	0.863	1.158
享有的社会保障				-0.032	-0.977	0.329	0.954	1.048
个人月收入				0.130	3.726	<0.001***	0.817	1.224
调整的R <sup>2</sup>		0.106			0.282			
模型F值		4.066			29.280			
模型显著性		0.018			<0.001			

注:\*,\*\*、\*\*\*分别指代10%、5%和1%显著性水平。



农民社会融合具有显著影响,而人均居住面积则接近显著。住房的商品化程度越高,一般意味着区位也越好,其社会融合具有天然的硬件优势;居住在“自购商品房”的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程度最高,其次是“租房”和“征地补偿房”,“宅基地建房”相对较低,这与住房类型和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均值的交叉分析结果(表6)也可以相互印证。

模型2是加入性别等8个控制变量后,进一步研究居住空间分异对社会融合的影响,结果发现:住房类型对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影响更为显著;人均居住面积对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影响从接近显著变为不显著,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样本中85.6%的城郊失地农民超过了该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

住房被视为不同社会阶层的重要表征和物质符号。宅基地建房、征地补偿房和自购商品房等居住类型所代表的市民化程度不同。征地补偿房等新形成的地域性社区在地理位置上属城市<sup>[40]</sup>,虽和城市社区在组织基础、功能与形态及社区治理思路和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本质上仍然属于同质社区,农民在失地进入征地补偿房集中居住,缺少与其他市民群体交往的机会,因此交往具有内倾性、边缘化的特点。久而久之,这种居住空间分异可能损害交往的多样性,造成社会隔离,拉大和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

3.2.2 控制变量对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影响

在模型2中,最初有10个控制变量,“受教育程度”和“所属地区”经过共线性诊断后排除。从分析结果来看,性别、年龄、职业、个人月收入、政治面貌和获得非农业户口的时间等个体特征对城郊失地农民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婚姻状况和享有的社会保障则影响不显著。这些控制变量影响的方向和程

度如下:(1)个体自然体特征因素:性别、年龄对于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具有极其显著的负向影响,即男性的社会融合程度低于女性;年龄越大,社会融合程度越低;(2)个体身份特征因素:职业和政治面貌是个体身份特征和地位的综合体现,对其社会融合具有极其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地位高、具有党/团员等政治身份的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程度高;(3)个体经济特征因素:个人月收入对其社会融合具有极其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越高,其社会融合程度也越高,该因素与职业对其社会融合影响方向和影响系数一致,这也印证了职业身份和收入本身也具有内在的关联性;(4)时间因素:征地和户口的“农转非”属于个体生命历程里的重要事件,获得非农业户口的时间越长,其社会融合程度高。

以上控制变量对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影响,可以从不同的住房类型附着的资源以及个体的人力资本2个方面寻找原因。首先,不同的住房类型的客观条件存在差别,包括区位、拥挤水平、住房质量和设施完备程度;对社会融合更为直接产生影响的是有形或无形地叠加或附着于住房和区位上的公共服务资源(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治安管理以及就业机会等<sup>[41]</sup>。有能力购买商品房的城郊失地农民,在经济上和城市居民差别已经不大,并表明其有强烈的主动融入城市的意愿,故社会融合程度也越高。其次,人力资本是“体现于人身体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其内涵为劳动者在教育、培训、实践、迁移、保健等领域或层面进行投资后所获得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等方面的积累。城郊失地农民人力资本存量普遍不足,就业质量不高,尤其是“无业或待业”的比例高(20.7%),这也导致了收入偏低,“无收入”的比例达到29.3%,很多农民失去土地的同时因为自身人力资本不足

表6 住房类型(含区位)与社会融合均值的交叉分析  
Tab.6 Crosstab analysis of housing type and social integration

住房类型 (含区位)	平均社会 融合	与其他城市居 民的交往情况	人际交往 范围	老市民的 友好程度	当前工作的 就职途径	受到不公平待遇 将采取的行动	参与村居委会 竞选
宅基地建房	3.14	2.77	3.13	3.58	2.19	3.55	3.72
自购商品房	3.33	3.24	3.04	3.70	2.30	3.79	4.02
征地补偿房	3.20	2.81	3.03	3.75	2.30	3.65	3.80
租房	3.25	2.72	2.89	3.44	2.86	3.50	4.06
单位(学校)的宿舍或公寓	2.74	2.33	3.00	2.33	3.00	3.33	2.67
其他	2.86	2.67	2.67	3.11	1.67	3.56	3.67
总计	3.20	2.85	3.03	3.69	2.30	3.65	3.82



无法就业,也就失去了经济来源,可能严重影响社会融合。

##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居住空间分异与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作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程度一般(3.20),与市民存在一定差距。在社会交往和社会网络方面,该群体社会网络的规模扩大和异质性增强,但社会交往仍然有“内卷化”倾向,与城市居民互动仍然不足;社会信任方面,偏向于强关系所形成的特殊信任,而对社会、体制以及陌生人所形成的普遍信任不高;社区参与方面,对公共事务较为关注,社区参与度高。

(2) 住房是社会融合的重要中间机制,居住空间分异影响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从住房类型(含区位)和人均住房面积这2个维度考察城郊失地农民的居住空间,住房类型和区位对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具有显著影响,而人均住房面积则影响不大。也就是说,住房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区位上更有优势,其社会融合程度也高;城郊失地农民的住房类型以“征地补偿房”为主,这种以集中安置居住为主而形成的居住空间分异会损害交往的多样性,容易导致社会隔离、影响社会融合。

(3) 不同自然特征、身份特征、经济特征的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存在差异性,人力资本的普遍不足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性别、年龄、获得非农户口时间、政治面貌、主要职业身份和个人月收入等个体因素与住房类型共同对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产生影响。其中,主要职业身份和个人月收入这2个因素影响方向和影响系数具有高度一致性,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城郊失地农民人力资本的普遍不足。人力资本存量的普遍不足导致该群体就业能力低、就业率低、就业质量不高,再加上失去土地这一经济来源,即使他们有强烈的主动融入城市的意愿,受到人力资本和经济收入的制约也很难真正融入。

为推动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推行混合居住模式、减少居住空间分异,在情景体验中促进社会融合。混合居住模式提供了控制居住空间分异的一种新尝试,可以纳入城

市规划中统筹考虑,减少人为的居住区位分割,能比较有效地化解同质性社区引发的区隔与矛盾。第二,提升城郊失地农民人力资本,增强就业能力。较高的人力资本是城郊失地农民实现经济融入、进而实现社会融合的关键。第三,增加公共投入,为推动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奠定坚实的基础。和市区、市民相比,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及其所集中居住的区域公共服务,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为此,需要政府在财政支出中增加基本公共投入,尤其是提高城郊失地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缩小差距。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结论的适用性与长三角地区较高的经济水平、较强的文化一致性,以及较完善的社会基本保障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中国其他地区而言,其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可能与长三角地区存在差异,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讨论。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叶超, 于洁. 迈向城乡融合: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结合研究的关键与趋势 [J]. 地理科学, 2020, 40(4): 528-534. [Ye Chao, Yu Jie. Towards rural-urban integration: Key issues and trends on linking new-type urbaniz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4): 528-534. ]
- [2] 文军, 沈东. “市民化连续体”: 农业转移人口类型比较研究 [J]. 社会科学战线, 2016(10): 179-189. [Wen Jun, Shen Dong. 'Citizenization continuum':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ypes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Social Science Front*, 2016(10): 179-189. ]
- [3] 文军. 论农民市民化的动因及其支持系统: 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8(4): 21-27. [Wen Jun. The motive of farmers transformation into townspeople and its supporting systems: Taking the suburbs of shanghai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06, 38(4): 21-27. ]
- [4] 申悦, 柴彦威. 基于日常活动空间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进展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6): 853-862. [Shen Yue, Chai Yanwei. Progress of research on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based on daily activity space of urban resident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6): 853-862. ]
- [5]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Oxford, UK: Blackwell, 1991.
- [6] 叶超, 塔娜. 重建地方: 人文地理与GIS结合研究的路径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8): 1249-1259. [Ye Chao, Ta Na. Rebuild place: The thoughts of place in human ge-

- ography and their connections with GI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8): 1249-1259. ]
- [7] 王丹, 刘祖云. 国外乡村空间研究的进展与启示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12): 1991-2002. [Wang Dan, Liu Zuyun. Progress and implications of international rural space research.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12): 1991-2002. ]
- [8] Harvey D.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M]. London, UK: Edward Arnold, 1973: 368.
- [9] Soja E W. The socio-spatial dialectic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0, 70(2): 207-225.
- [10] 蒋亮, 冯长春. 基于社会—空间视角的长沙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 [J]. *经济地理*, 2015, 35(6): 78-86. [Jiang Liang, Feng Changchun. The study of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in Changsha based on the social-spatial perspective.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6): 78-86. ]
- [11] Castells M. *The Information Age* [M].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384-388.
- [12] 约翰斯顿 R J. 人文地理学词典 [M]. 柴彦威,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634. [Johnston R J.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Translated by Chai Yanwei, et al. Beijing, China: Commercial Press, 2004: 634. ]
- [13] 胡蓉. 社会分层与住房资源分化 [J]. *广州公共管理评论*, 2013(1): 95-117, 349. [Hu Rong.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housing resources differentiation. *Guangzhou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3(1): 95-117, 349. ]
- [14] 沙森 S. 全球城市: 纽约 伦敦 东京 [M]. 周振华, 等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306-308.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Translated by Zhou Zhenhua, et al.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5: 306-308. ]
- [15] 吴启焰, 张京祥, 朱喜钢, 等. 现代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机制的理论研究 [J]. *人文地理*, 2002, 17(3): 26-30. [Wu Qiyang, Zhang Jingxiang, Zhu Xigang et al.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urban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in China. *Human Geography*, 2002, 17(3): 26-30. ]
- [16] 边燕杰, 刘勇利. 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 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 [J]. *社会学研究*, 2005(3): 82-98. [Bian Yanjie, Liu Yongli. Social stratification, home ownership, and quality of living: Evidence from China's fifth census. *Sociological Research*, 2005(3): 82-98. ]
- [17] 李强, 李洋. 居住分异与社会距离 [J]. *北京社会科学*, 2010(1): 4-11. [Li Qiang, Li Yang.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social distance. *Social Science of Beijing*, 2010 (1): 4-11. ]
- [18] 刘精明, 李路路. 阶层化: 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 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05(3): 52-81. [Liu Jingming, Li Lu-lu. Becoming stratified: Residential spaces, lifestyles, social networks and class ident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social strata in urban China. *Sociological Research*, 2005 (3): 52-81. ]
- [19] 孙斌栋, 吴雅菲. 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J]. *城市规划*, 2009(6): 73-80. [Sun Bindong, Wu Yafei.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esidenti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hinese cities.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9(6): 73-80. ]
- [20] 肖黎珊, 李新虎, 张国钦, 等. 厦门常住人口社会分层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2): 183-190. [Xiao Lishan, Li Xinhua, Zhang Guoqin, et al. Empirical study of population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policy suggestions in Xiamen Cit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 31(2): 183-190. ]
- [21] 田明. 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比较研究 [J]. *人文地理*, 2014, 29(1): 43-48. [Tian M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igrant urban integration wit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Human Geography*, 2014, 29(1): 43-48. ]
- [22] 李志刚, 薛德升, 杜枫, 等. 全球化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 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例 [J]. *地理研究*, 2009, 28(4): 920-932. [Li Zhigang, Xue Desheng, Du Feng, et al. The local response of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 under globalization in urban China: A case study of African enclave in Guang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9, 28(4): 920-932. ]
- [23] 罗震宇, 秦启文.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与群体隔阂: 对失地农民城市居住问题与对策的思考 [J]. *城市发展研究*, 2009, 16(1): 8-11, 19. [Luo Zhenyu, Qin Qiwen.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group gap: The study on the problem and solution of land-lost peasants' residence in the city. *Urban Studies*, 2009, 16(1): 8-11, 19. ]
- [24] 潘泽泉, 邹大宽. 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社会距离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社会距离效应的分析 [J]. *学习与实践*, 2017(5): 107-117. [Pan Zequan, Zou Dakuan. Study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ocial distance in the process of land lost farmers' citizeniz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ocial distance effect. *Study and Practice*, 2017(5): 107-117. ]
- [25] 赵琴. 居住空间分异及其对城郊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影响: 基于贵州省凤冈县的调研数据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 36(9): 71-78, 111-112. [Zhao Qin.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effect of which on the City integrating of land-lost peasants: Based on data from a survey of Fenggang County in Guizhou Province.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5, 36(9): 71-78, 111-112. ]
- [26] 李倩, 李小云. “分类”观念下的内倾性社会交往: 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困境 [J]. *思想战线*, 2012(5): 43-47. [Li

- Qian, Li Xiaoyun. Introverted social interac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classification": The dilemma of landless peasants' citizenization. *Thinking*, 2012(5): 43-47. ]
- [27] 沈关宝, 李耀锋. 网络中的蜕变: 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与市民化关系探析[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2): 99-107. [Shen Guanbao, Li Yaofeng. Change in network: Analysis on social network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nd-lost farmers into townspeople. *Fudan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0(2): 99-107. ]
- [28] 王慧博. 失地农民市民化社会融入研究 [J]. 江西社会科学, 2011(6): 234-240. [Wang Huibo. A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landless farmers into the civil society.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2011(6): 234-240. ]
- [29] 王晓刚, 陈浩. 城郊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性差的影响因素: 以郑州市为例 [J]. 城市问题, 2013(2): 68-73. [Wang Xiaogang, Chen Hao.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ad city adaptability of the land-lost farmers in the suburbs of Zhengzhou City. *Urban Problems*, 2013(2): 68-73. ]
- [30] 曾刚, 林兰, 叶森. 长三角区域产业联动的理论与实践 [J]. 上海城市规划, 2011(2): 18-25. [Zeng Gang, Lin Lan, Ye Se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n regional industry coope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1(2): 18-25. ]
- [31] 柴攀峰, 黄中伟. 基于协同发展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格局研究 [J]. 经济地理, 2014, 34(6): 75-79. [Chai Panfeng, Huang Zhongwei. Spatial patter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ased on synergy development.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6): 75-79. ]
- [32]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6》主要内容 [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7(2): 131. [China Center for Human Capital and Labor Market Research. Main content of 'China Human Capital Report 2016'. *Journal of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2017(2): 131. ]
- [33] 任远, 乔楠. 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 [J]. 人口研究, 2010, 34(2): 11-20. [Ren Yuan, Qiao Nan. Social integration for migrants: Process, measurement and determinants. *Population Research*, 2010, 34(2): 11-20. ]
- [34] Van der Poel M. Delineating personal support networks [J]. *Social Networks*, 1993, 15(1): 49-70.
- [35] 熊剑平, 刘承良, 袁俊. 国外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研究进展 [J]. 世界地理研究, 2006, 15(1): 63-70. [Xiong Jianping, Liu Chengliang, Yuan Jun. Progress in foreign research on economic linkages of city agglomeration.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06, 15(1): 63-70. ]
- [36] 孟德友, 李小建, 陆玉麒, 等.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演变 [J]. 经济地理, 2014, 34(2): 50-57. [Meng Deyou, Li Xiaojian, Lu Yuqi, et al.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Yangtze River Delta.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2): 50-57. ]
- [37] 王桂新, 陈冠春, 魏星.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 以上海市为例 [J]. 人口与发展, 2010, 16(2): 2-11. [Wang Guixin, Chen Guanchun, Wei Xing.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urban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be urban citizens in Shanghai.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0, 16(2): 2-11. ]
- [38] 程名望, 乔茜, 潘烜. 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及市民化程度测度: 以上海市农民工为例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7, 38(3): 413-420. [Cheng Mingwang, Qiao Xi, Pan Xuan. The index system and the measure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of rural migrants: A case study of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7, 38(3): 413-420. ]
- [39] Uslaner E.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5-60.
- [40] 牛慧恩, 孟庆民, 胡其昌, 等. 甘肃与毗邻省区区域经济联系研究 [J]. 经济地理, 1998, 18(3): 51-55. [Niu Hui'en, Meng Qingmin, Hu Qichang, et al. Economic interaction analysis between regions of Gansu Province and their surrounding areas. *Economic Geography*, 1998, 18(3): 51-55. ]
- [41] 郑思齐, 廖俊平, 任荣荣, 等. 农民工住房政策与经济增长 [J]. 经济研究, 2011(2): 73-86. [Zheng Siqi, Liao Junping, Ren Rongrong, et al. Housing policy for migrant workers and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1(2): 73-86. ]



## Mechanism of residenti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ffect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landless farmers in suburb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ZHANG Haina<sup>1,2</sup>, ZHU Yiwen<sup>1,2\*</sup>, DENG Xiaoxiang<sup>3</sup>

(1.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Institute of Urban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3. National Institutes of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Urbanization in China has changed from speed focused to quality focused. The core of this change is to realize the urbanization of people, that is, the citize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who have moved to cities and towns. After land requisition, the suburban landless farmers often need a new place of living, and the residential form has changed from the original homestead construction to the coexistence of various form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data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is study took the social-spatial perspective as the main approach of research, and used regression model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residenti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landless farmers in suburbs. The study found that housing type, as the main dimension of residential space differentiation, affects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landless farmers in suburbs, while human capital factors such as individual monthly income and housing type work together. On this basis, we put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implementing mixed residential mode, enhancing employment ability, and increasing government input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citizenization process of landless farmers.

**Keywords:** residential space; social-spatial; suburban landless farmers; social integration; Yangtze River Delta